

讀帖閱世——

拓本、《定武蘭亭》與《游相蘭亭》的文化意涵

■ 何碧琪

在現代印刷術出現以前，拓本是中國書法、碑帖及金石學傳播的主要載體，蘊含中國文字學、經學、歷史、繪畫等豐富內涵，亦反映中國文人學者對文字、書法及記錄歷史的熱衷與智慧，在世界文化史中顯得非常獨特。

關於拓本

拓本是用紙覆蓋在經過刻或鑄的石或青銅的表面，用刷具將紙擦入刻字或紋飾中，再以刷擦或以拓包將墨拍打在平面上或凸出之處，凹下去的地方不會上墨，於是形成墨黑紙白的陰陽效果。千變萬化的陰文、陽文構成的文字及圖案，就如太極衍生萬物，記錄著發生在中國歷代皇室、貴族、士大夫、百姓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社會等方面的活動。

拓本令碑文或青銅器銘文超越時間及空間的限制，由三維的器物轉換為二維的紙本，拓本突破了金石本身的時空制約，令銘文超越空間與地域，由固定於一地的大型器物或碑刻化為可以流轉於文人學者間的珍貴資料，複本令資料的流通量大增之外，更減少了儲存的空間。古代與今天人們用以保存資料的材質不同，而拓本的應用與現代學術界將資料數位化的理念則有共通之處。

另外，碑帖刻石或因地震碎裂、風化或不斷椎搗而受損，而紙本保存得當的話，則能壽千年，因此銘文寄託於拓本，大大延長了碑帖的壽命，尤其是《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

（圖1）及米芾（1051-1107）《英光堂帖》（圖2）等原碑石、帖版或墨蹟已不存的話，則更顯拓本的珍貴，甚至被古人視為真蹟，而此兩種宋拓本亦因稀有及高質量，均已獲列入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碑帖拓本收藏的發展史

拓本受到珍視並獲收藏，其內容的文學、書法或學術的水平、摹刻與拓印的技藝等，均是決定拓本價值的重要因素。回溯墨蹟、摹本與碑帖拓本相繼被視為收藏品的歷史，書法美學的特質是關鍵。查考現存文獻，信札被視為書法作品被整理及遞藏，至少溯源至東晉桓玄（369-404），他裝幀王羲之（約303-361）及王獻之（344-386）父子的正書與行書作鑑藏。¹

唐代是製作摹本的高峯，主要是單帖，偶有以單一書法家的作品為集帖。據張彥遠（約815-876後）《法書要錄·右軍書記》所載，貞觀年間褚遂良（597-658）曾校正王羲之信劄，製作館本《十七帖》摹本（亦有說是刻本）等，用以鑑藏及賞賜大臣。法帖摹本之外，唐代已出現因書法水平高超而被珍藏的碑刻拓



圖1 東漢 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 冊 宋拓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北山堂惠贈 館藏編號：1973.0678 鄧明亮攝 圖片由中大文物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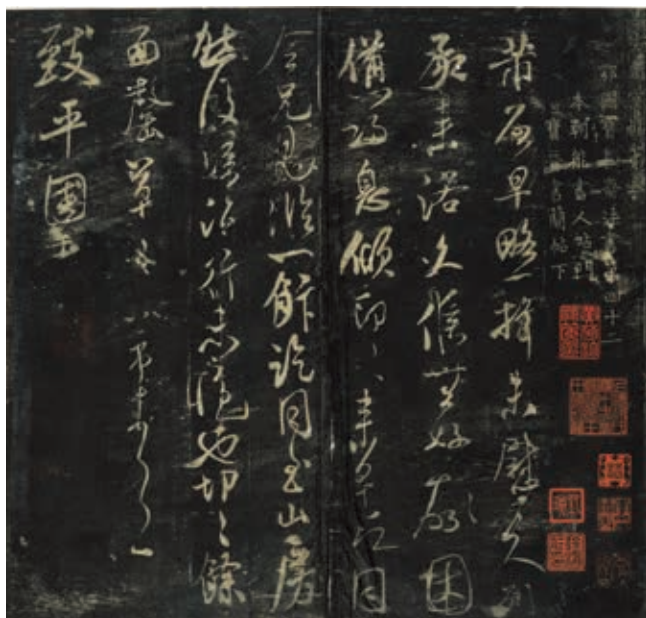


圖2 宋 米芾 英光堂帖（徐渭仁舊藏本） 冊 宋拓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北山堂惠贈 館藏編號：1996.0156 鄧明亮攝 圖片由中大文物館提供

本，裝裱成卷或冊頁獲皮藏，早至七至八世紀的傳世墨拓本，包括清末於敦煌發現的歐陽詢（557-641）《化度寺碑》、唐太宗（626-649 在位）《溫泉銘》及柳公權（778-865）《金剛經》拓本（法國國家圖書館藏，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以上相信都是以原墨蹟上石或書法家書丹後所摹刻。到了五代十國，文獻有「命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保大七年，949）等關於南唐官私摹勒刊刻法帖的記載，² 集帖由單一書家擴充至不同書家的古今法帖。

至北宋，刻帖的規模逐漸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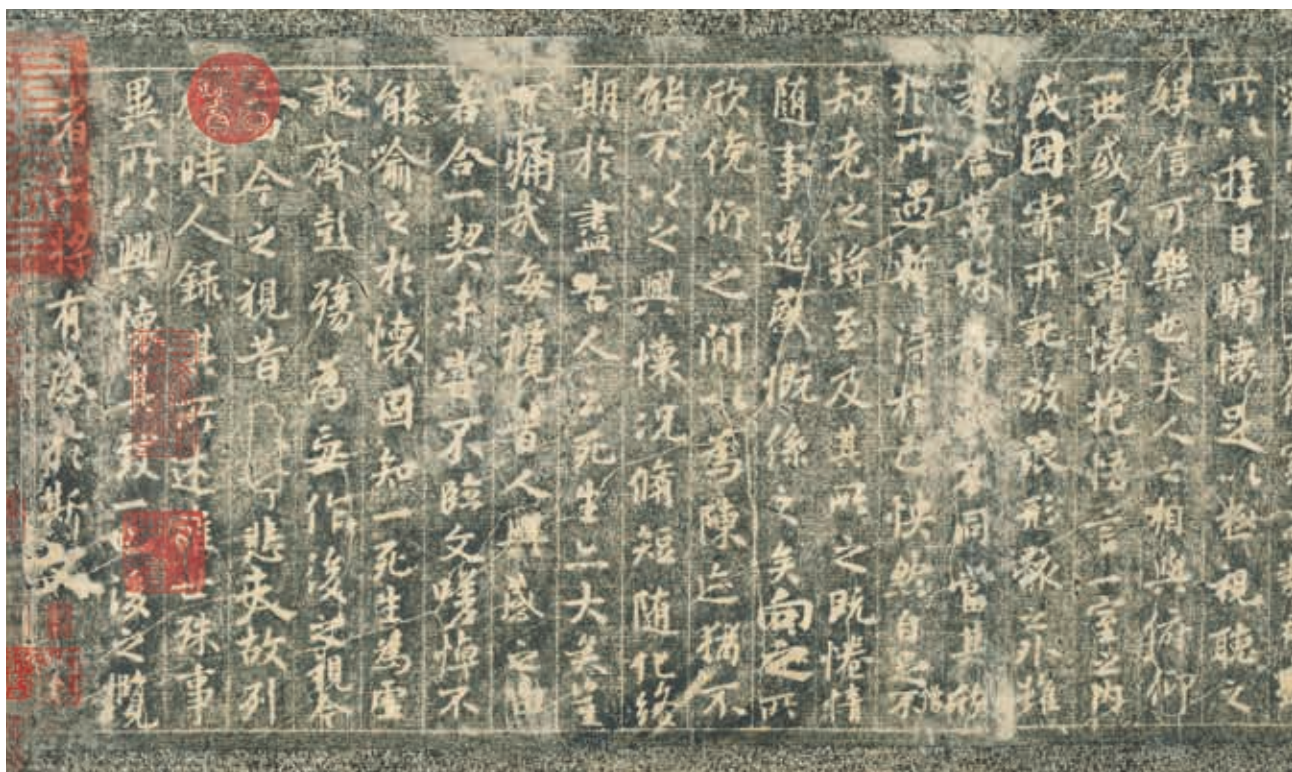


圖3 東晉 王羲之 定武蘭亭真本 卷 宋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帖000001

太平興國二至八年（977-983），昇州獻王羲之、獻之、桓溫等十八家石版書蹟及其他魏晉至唐名家墨蹟。宋太祖和太宗以文治國，大規模纂修叢書，包括《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及《冊府元龜》等文化工程，而於淳化三年（992）太宗刊刻《淳化閣帖》（以下簡稱《閣帖》）十卷亦屬於項目之一，由官方匯集墨蹟及石刻摹刻上石，編成叢帖。因為當時刻版藏於祕閣，此帖只賜予進登二府（即中書省及樞密院）的大臣，即使偶爾被批評，《閣帖》仍被賦予崇高地位，獲尊為「法帖之祖」，「法帖」的專稱凸顯了刻帖作為書法範本的功能與意義，而以二王為首的典雅書風也被視為官方認可的書法風格而佔有幾近獨尊的地位。

中央與地方官員以精良的紙、墨，通過摹

刻及拓印技術製作書蹟複本，《大觀帖》、《汝帖》等叢帖應運而生。這些仿如百科全書式的書法「圖錄」，代表了宋人對於上古至五代書學發展的重新認識及總結。東晉王羲之的筆法在宋代興盛，也被保留在南宋刻帖內，如岳珂（1183-1241 後）集刻的《英光堂帖》（見圖2）收入的北宋米芾法帖，此刻帖形神俱備地保存了米芾瀟灑跌宕的行草書法，可說是書法美學、摹刻技術及紙墨工藝渾然天成的傑作，見證著兩宋文藝與科技的卓越成就。相對當時仍處於被宗教籠罩的中世紀歐州，宋代法帖所展現的人文精神特別讓人驚嘆。

南宋至清代由宗室、郡齋、士紳等主持的書法刻帖如雨後春筍出現。書法史上以二王為首的傳統，於東晉至唐代先由貴族、宗室的階



層爬升至帝王的推崇，再從上而下由皇帝、皇室、大臣、地方官員、士紳至文人擴散。特別是明、清時代宮廷及中央好尚王羲之、趙孟頫（1254-1322）及董其昌（1555-1636）等書法，逐漸演變成臺閣體或館閣體之後，書藝變成科舉考核不能忽略的技能，不其然大增了文人對書法範本的需求，於是摹本、刻帖等趨向量產的複本製作也應運而生。由於買賣法帖拓本能獲厚利，於是無可避免地出現質量參差及造假的刻帖拓本，讓人以重價購得偽本而損失慘重，令拓本被標籤「黑老虎」的污名。

宋代拓本的豐富意涵

法帖之外，北宋時代碑刻拓本被賦予更深刻的意義與內涵。北宋黃伯思（1079-1118）述

及在唐代只有漢《石經》的拓本鈐「開元」二字小印，與法書名畫同藏於御府外，「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³一方面漢、唐以來已有「刊銘金石，永世不忘」及「非金石則無以示久遠」的思想，⁴刊銘於青銅及碑石本身是非常隆重具儀式性的活動，是出於人們希冀刊刻內容能夠永恆存留。碑刻拓本在北宋受到高度關注，原因之一是歐陽修（1007-1072）推崇碑刻上記載聖賢的思想、精神及美德，可是金石「百年亦有終」，⁵於是擁有「紙壽千年」優勢的拓本便共同擔起傳承聖賢精神的使命。歐陽修是北宋開一代風氣的文壇領袖，他的觀念帶動了北宋金石學及拓本收藏的高峯。當時士人學者研究金石學的目的之一，是重訪及重溯夏商周三代以來源於中原的典章制度、思想及文化，以重振及重建漢文化的精神命脈。這是由於南北朝至唐代佛道二教席捲天下，北宋文人承襲中唐韓愈（768-824）與柳宗元（773-819）等古文家的觀念，由文學上的古文運動開始，以復興儒家思想來抵禦佛教的威脅，宋儒於是深入尋找自身的文化根源，彷彿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新古典主義及啓蒙時期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宋儒超越了當時世界仍普遍受政治與宗教的制約，形成關注自身歷史的意識、士人文化及人文關懷。因此在北宋以後，除了名家的書法拓本外，碑石及青銅器銘文的拓本也受到注視，所以中國拓本的存在本身已透露著它在世界文化史中的獨特意義，當時人們願意投放資源於摹刻碑帖、製作及收藏拓本等文化事業，反映北宋豐富的精神文明及社會的富饒。

書法、史學及金石學大盛於北宋，碑刻拓本的流傳與收藏等風氣集中在東京汴梁及西京洛陽（今河南開封及洛陽）等政治與文化中心。隨著宋室南渡，金石拓本與刻帖亦成為江南文



圖5 游相蘭亭 甲之四 中山王氏家藏本 冊 宋拓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北山堂惠贈 館藏編號：1973.0622 鄧明亮攝
圖片由中大文物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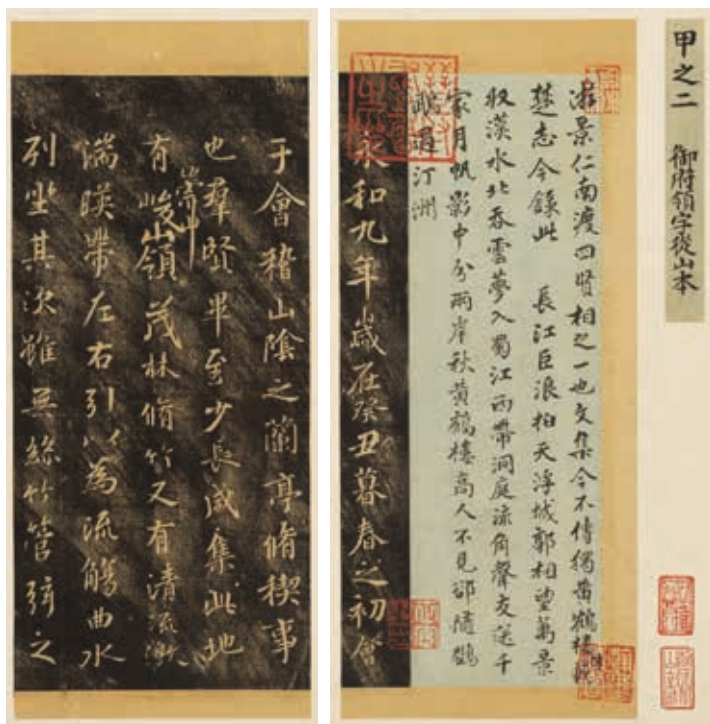


圖4 游相蘭亭 甲之二 御府鎮字從山本 冊 宋拓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北山堂惠贈 館藏編號：1973.0618 鄧明亮攝 圖片由中大文物館提供

化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南宋首都臨安及陪都建康（今浙江杭州及江蘇南京）。由於兩宋之交大量書畫真蹟、善本及文物流失，已不知所蹤或已損壞的石刻，人們特別珍視它們的拓本，如王厚之（1131-1204）談到所得的《石鼓》拓本，因當時原刻存亡未知，認為「拓本留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⁶令拓本與法書的地位再拉近一步。另外，南宋人更為拓本抹上濃重的感情色彩。高翥（1170-1241）觀宋高宗詩翰的拓本後題詩云：

「淡黃越紙打殘碑，盡是先皇御賜詩。白髮內人和淚讀，為



曾親見寫詩時。」⁷此時拓本猶如書蹟，足以令人睹物思人。碑版拓本確實是歷史人物及先祖們活動的忠實記錄，而且是原大拓印，假如是摹刻精彩的書法傑作，更是書法家本人心畫的呈現。以下透過〈定武蘭亭真本〉（圖3）與《游相蘭亭》（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等版本仔細比較，討論《定武蘭亭》帖石在唐至南宋初字損的先後及變化，以及宋室南渡後《蘭亭序》拓本被不斷重刻背後的非凡意義。

以《定武蘭亭》與《游相蘭亭》為例

一、比對《游相蘭亭》特徵探討《定武蘭亭》帖石的字損年代

《游相蘭亭》是指南宋理宗朝丞相游侶（或似，？～1252）所收藏的近一百種《蘭亭》拓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十種，均由利氏北山堂捐贈，並列入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十種包括：

1. 甲之二 御府領字從山本（圖4）
2. 甲之四 中山王氏家藏本（圖5）
3. 甲之五 御府本
4. 甲之八 括蒼劉涇本（圖6）
5. 乙之一 雙鉤部分字本
6. 乙之五 錢塘許氏本
7. 丙之八 會稽本（圖7）
8. 庚之三 莫知所出本（圖8）
9. □之四 湯舍人本（圖9）
10. 臨川本

除了1、2及5之外，其餘七種均演變自《定武蘭亭》拓本，顯示《游相蘭亭》與《定武蘭亭》關係密切。

北宋時人們普遍認為《定武蘭亭》是據歐陽詢臨本摹刻，一直受到珍視。《定武蘭亭》原石與國家命運扣連一起，據記載此刻石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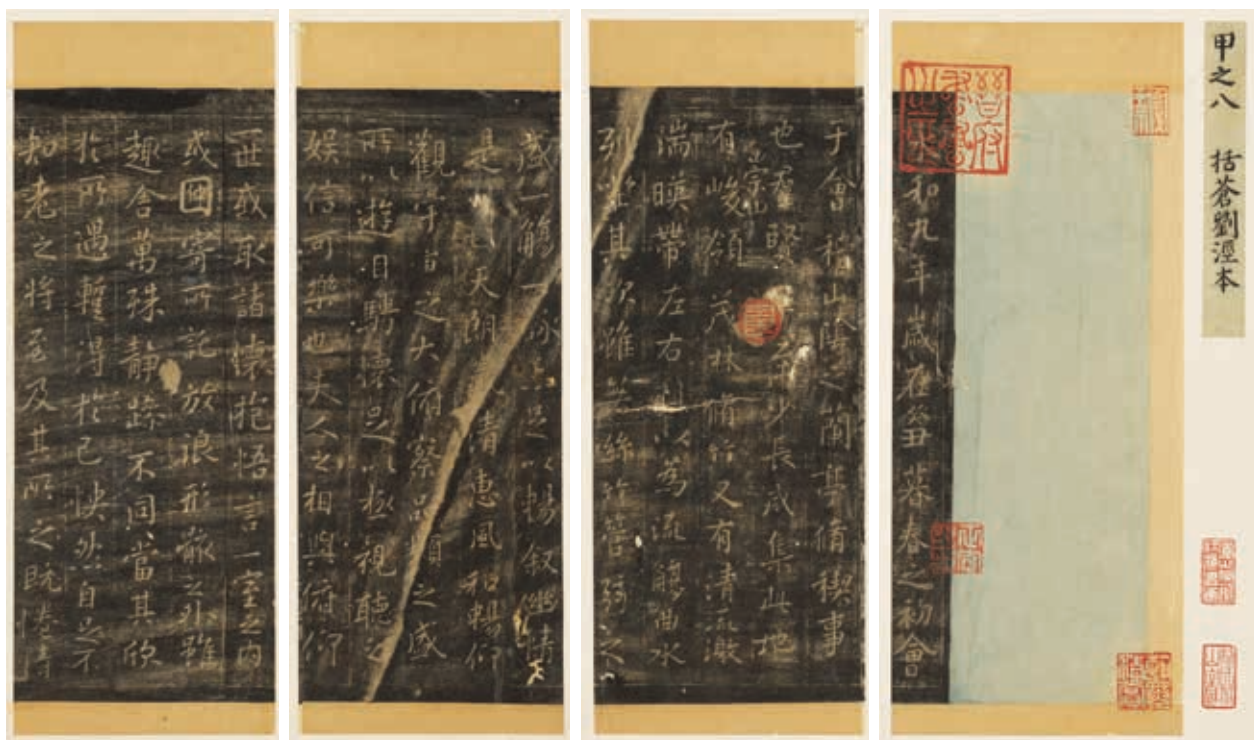


圖6 游相蘭亭 甲之八 括蒼劉涇本 冊 宋拓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北山堂惠贈 館藏編號：1973.0621 鄧明亮攝
圖片由中大文物館提供

代後晉末被契丹掠去，其後遭棄置於真定，當時該地受義武軍管治，至宋太宗趙光義（939-997）登基，因避諱「義」字而將該地改為「定武」（位於今河北正定縣），於是此刻石及拓本被稱為《定武蘭亭》。⁸

《定武蘭亭》拓本的版本問題非常複雜，筆者仔細比較〈定武蘭亭真本〉及各種《游相蘭亭》，輔以南宋桑世昌《蘭亭考》「定武」條記載字損數目不同的版本，整理出《定武蘭亭》字損的先後次序及實際年代，或有助判斷版本及成為斷代的標尺。⁹

（一）「九字損」：「亭」、「羣」、「列」、「幽」、「盛」、「遊」、「殊」、「古」、「不」

「九字損」大約出現於五代（907-960），包括「亭」（第二行）、「羣」（第三行）、「列」

（第六行）、「幽」（第七行）、「盛」（第九行）、「遊」（第十行）、「殊」（第十四行）、「古」（第二十行）、「不」（第廿一行），這九字當是陸續受損的。據文獻記載，《定武蘭亭》先出現「九字損」，後來才有「五字損」（「帶」、「右」、「湍」、「流」、「天」，見下文）。¹⁰《游相蘭亭》中「甲之八 括蒼劉涇本」（見圖6）擁有《定武蘭亭》的基本特徵，包括第四行「激」字中間作「身」字、第十三行第二字作「因」字而中央改為「仲」字，其他特徵如刻有烏絲欄。由於此本上述九字未損，首行末保存「會」字，所以此本當是根據五代以前的《定武蘭亭》版本摹刻。此本末刻北宋「紹聖丁丑（1097）蜀人劉涇」，據米芾記載劉涇曾得唐絹本《蘭亭》，¹¹此「括蒼劉涇本」當是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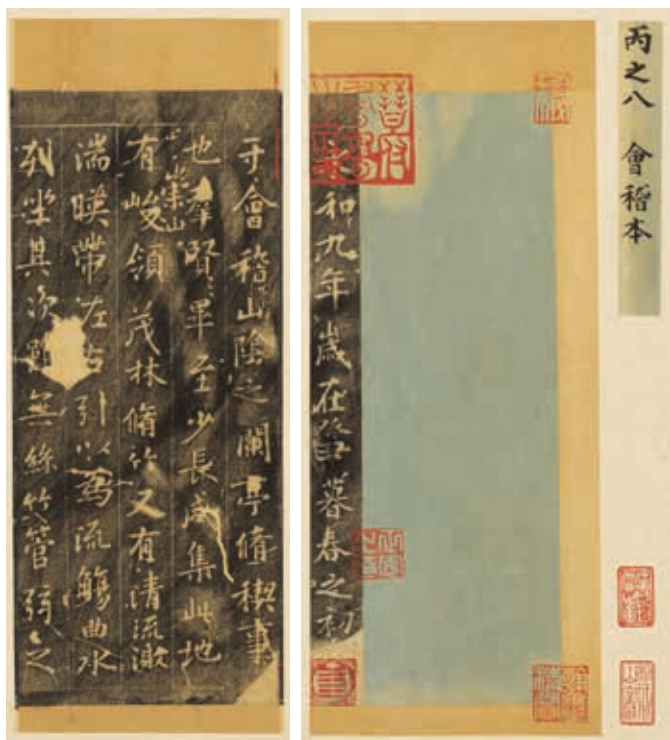


圖7 游相蘭亭 丙之八 會稽本 冊 宋拓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北山堂惠贈
館藏編號：1973.0624 鄧明亮攝 圖片由中大文物館提供

宋人根據北宋劉涇所藏的唐絹本《蘭亭》重刻，該唐絹本九字未損，合於五代以前《定武蘭亭》的字損情況。不過「甲之八 括蒼劉涇本」第十五行末「不」字旁無「僧」字（見圖6，按：此字通常被視為南朝梁鑑書人徐僧權的款識）、十七行「向之」所遮蓋修改的字未有依樣摹刻，顯示未完全忠於摹刻。另外此本比〈定武蘭亭真本〉（見圖3）整體字畫偏瘦，可能是因為摹自絹本所致。

（二）增「三字損」：「會」、「峻」、「為」

北宋初（十世紀末），「九字損」外增加「三字損」，即「會」（第一行）、「峻」（第四行）、「為」（第五行）。《游相蘭亭》「乙之五 錢塘許氏本」九字中獨「殊」（第十四行）未損，而「會」已缺而「峻」稍泐，「五字損」

中僅「流」字損。由於此本異於《定武蘭亭》字損的順序，整體的字畫與〈定武蘭亭真本〉相去較遠，是定武再翻本，¹² 它的母本（或稱底本）可能重刻自北宋初版本，屬於《定武蘭亭》的分支。

（三）增「五字損」前期：「帶」、「右」、「湍」

熙寧年間（1068-1077）薛向帥定武時「帶」、「右」、「湍」（均第五行）先後損；版本比對發現所謂「五字損」實非損於同時，而是「帶」、「右」最先受損，「湍」隨其後。《游相蘭亭》「庚之三 莫知所出本」在五字中只損「帶」（見圖8）；而「丙之八 會稽本」、「□之四 湯舍人本」（見圖7、9）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宋拓王沈本」（亦是《游相蘭亭》，刻於慶元間，

1195-1200）¹³ 三本僅「帶」、「右」二字損，上述四本都是將母本的石花、裂紋忠實摹刻的定武重刻本，而且都按上述「九字損」、「三字損」、「五字損」的順序規律出現字損，四本均是南宋游侶舊藏，它們的母本當是北宋初至熙寧拓印的《定武蘭亭》拓本。

此外，進一步比較其他流傳有緒的定武翻刻本如「許彥先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先損「帶」、「右」二字、「韓珠船本」多損「湍」字，¹⁴ 都可證明「五字損」是依照「帶」、「右」、「湍」、「流」、「天」的順序及規律相繼殘損。文獻記載的「定武五字損本」其實不是同一時間殘損，而是由於不斷拓印泐損或自然風化而逐步造成的，並非同時被刻意毀壞。故此文獻記載熙寧時薛向得《定武蘭亭》後，「其子紹



圖8 游相蘭亭 庚之三 莫知所出本 冊 宋拓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北山堂惠贈 館藏編號：1973.0627 鄧明亮攝 圖片由中大文物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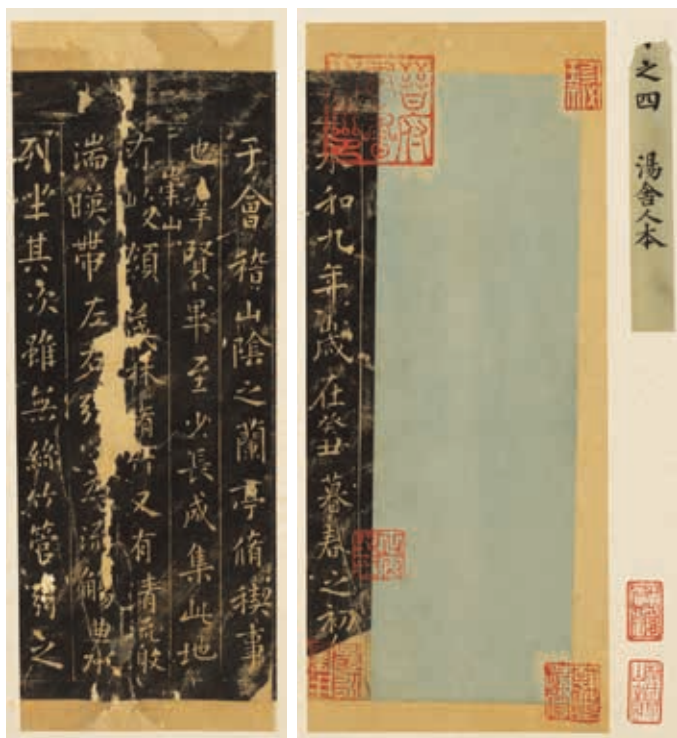


圖9 游相蘭亭 之四 湯舍人本 冊 宋拓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北山堂惠贈 館藏編號：1973.0625 鄧明亮攝 圖片由中大文物館提供

彭竊歸洛陽，並斲損『湍、流、帶、右、天』以惑人」的說法，¹⁵並不是事實，或許是時候還薛紹彭清白。

(四) 增「五字損」後期：「流」、「天」

薛紹彭得《定武蘭亭》帖石後至北宋末，「五字損」中「流」（第五行）及「天」（第八行）亦受損，時約十一世紀後半。《游相蘭亭》「甲之四 中山王氏家藏本」（見圖5）包括了上述「九字損」、「三字損」、「五字損」的特徵，並且校以《定武蘭亭真本》的石花紋，如十二至十六行貫穿「世」、「因」、「萬」、「遇」、「將」的一線裂痕都如實重刻了。此本末刻有「中山王氏家藏」、「安中」等印，可知「甲之四 中山王氏家藏本」其實是據王安中（1075-1134）舊藏本所刻，南宋游侶得於曹翬（1170-1249），當時刻石已不知所蹤。值得注意的是王安中與薛紹彭活躍於同時代，此「甲之四 中山王氏家藏本」可說是北宋末《定武蘭亭》原石損壞狀況的忠實記錄。

(六) 增「十六字損」：「無絲竹管弦之」、「一觴一詠亦足以」、「是日也」

南宋桑世昌《蘭亭考》記第六至八共三行有破裂，損壞上述十六字，這與〈定武蘭亭真本〉

（見圖3）頗相近。另外王厚之記《定武蘭亭》原石至北宋宣和（1119-1125）間歸入御府，南宋建炎（1127-1130）初抗金名將宗澤（1060-1128）把石送至維揚，建炎三年（1129）金兵破維揚，帖石不知所在，¹⁶是年二月宋高宗倉促逃往杭州，這是《定武蘭亭》原石第二次遭逢國難。假如上述的記載無誤，審視〈定武蘭亭真本〉的字損情況，那很可能是建炎年間拓於《定武蘭亭》原石的最後期拓本。

二、《定武蘭亭》與《游相蘭亭》的文化意涵

細閱文物館藏《游相蘭亭》十種拓本，恰好反映了以宋高宗（1107-1187）（「甲之二 御府領字從山本」與「甲之五 御府本」是高宗臨本）與南宋都城臨安（「乙之五 錢塘許氏本」、「□之四 湯舍人本」）為中心，幅射至會稽（「乙之一 雙鉤部分字本」、¹⁷「丙之八 會稽本」）、甚至括蒼（今屬浙江台州，「甲之八 括蒼劉涇本」）等浙江一帶的「蘭亭文化圈」，從南宋回溯大約九百年，正是這區域孕育了王羲之《蘭亭序》（東晉永和九年，353）。至元代，吳興趙孟頫（亦屬浙江）也成為復興王羲之書學最具代表性的書法家。

宋高宗熱衷臨寫《蘭亭序》固然是引起士人收藏《蘭亭序》風氣之一大原因，南宋時近一百種的《游相蘭亭》便以高宗所臨的「御府本」為首，而文物館藏《游相蘭亭》十種中有七種屬於《定武蘭亭》系統，即佔比七成，充分反映了南宋時期《定武蘭亭》刊刻及收藏的盛況，這與文獻中樓鑰（1137-1213）記載時人熱愛《定武蘭亭》的現象相呼應：

……此石歸紹彭。又言入內府，宣取恐遠程。焚膏繼晷，拓本手不停。疊紙至三四，肥瘠遂異形。南渡愈難見，得者輒相矜。我見十數本，對之心欲醒。汪侯端

明子，嗜古自弱齡。錦囊荷傾倒，快睹喜失聲。帶流及右天，往往字不成。而此獨全好，護持如有靈。尤王號博雅，異論誰與評。硬黃極摹寫，唐人苦無稱。贗本滿東南，瑣瑣不足呈。猶有發與撫，砭砭近璜珩。右軍再三作，已覺不稱情。心摹且手追，安能效筆精。響搗固近似，形似神不清。不如參其意，到手隨縱橫。¹⁸

因《定武蘭亭》在南渡後愈難見，得者都很珍惜，當時贗本充斥，而縱使拓本非墨蹟或響搗，仍能「參其意」，縱橫揮筆。

另外，王柏（1197-1274）提及南渡時失去大量文物，人們愛《蘭亭序》深切，以致翻刻不絕，版本紛陳：

玉華末命昭陵土，《蘭亭》神蹟埋千古。率更搨本入堅峯，徽帝歸裝投定武。薛家翻刻愚貴遊，舊石宣和龕御府。黃塵橫空飛渡河，中原荊棘穴豺虎。維揚蒼茫駕南轅，百年文物不堪補。紛紛好事競新模，傾歆醜俗亡遺矩。如今薛本亦罕見，髣髴典型猶媚嫵。清歡盛會何足傳，右軍他帖以千數。託言此筆不可再，慨然陳迹興懷語。今昔相視無已時，手掩塵編對舊雨。¹⁹

一方面，《蘭亭序》由明君典範的唐太宗收藏，已成為國家重器的代表，至五代及北宋末《定武蘭亭》帖石的亡佚又直接與國難有關，故此南宋士大夫不斷重刻此帖，也是出於保存國家文化命脈的情意結。另外，宋室由汴京南渡建都臨安與陪都建康，與從前晉室從洛陽南渡建都建康，經歷是何等相似，宋人與晉人同樣面對失去半壁江山之痛，而回首當時東晉王羲之等數十位才俊修禊於紹興蘭亭，繼而寫成千古名篇《蘭亭序》，「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圖10 「蘭亭大觀」展覽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展廳一 取自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檔案室黑白照片（攝於1973年4月9日） 圖片由中大文物館提供

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南宋文人讀來不免觸景生情，感觸良多。趙孟頫曾記「（定武）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²⁰正是由於《蘭亭序》那發自晉人靈魂深處的感慨，始終牽動著南宋文人的心，縈迴繚繞，揮之不去。於是化成《游相蘭亭》等萬千的拓本，借物抒懷，因而面貌各異的《蘭亭序》拓本在南宋時湧現。

直至清代中晚期，廣東著名收藏家吳榮光（1773-1843）及孔廣陶（1832-1890）亦收藏超過一百種《蘭亭序》拓本。其後，廣東的《蘭亭序》及拓本收藏風氣隨著廣東文化精英南移

而植根香港，1973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舉辦「蘭亭大觀」特展，清末由廣州海山仙館主人潘仕成（1804-1874）收藏的《游相蘭亭》十種亦是當中的重點展品。（圖10）當時私人收藏的《游相蘭亭》早已由創館館長屈志仁教授向利榮森（1915-2007）博士推薦購入，並捐贈文物館，化私為公，近年陸續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至今已成為香港拓本收藏的標誌性藏品。今年適逢文物館金禧館慶，《游相蘭亭》十種將於「廣納百川——明至清中期廣東書畫選」第二期（2021年8月27日至11月28日）分兩批展示，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刻

石取拓——故宮碑帖特展」（2021年9月30日至12月26日）的〈定武蘭亭真本〉互相輝映。

《蘭亭序》及碑帖拓本是宋人金石文化與江左風流南來至臺灣及香港的見證。讀帖閱世，感

通古人，願吾人領略拓本所蘊含的豐富意涵，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讓這份人文精神永垂不朽。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研究員

註釋：

1. 參（南朝宋）虞蘇，〈論書表〉，收入楊成寅主編，《中國歷代書法理論評注（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6），頁211-213。
2.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3，據清周昂重刻本點校），冊1，卷16，頁215。
3. （宋）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8，據古逸叢書三編影印），法帖刊誤卷下，〈記石經與今文不同〉，頁108-112。
4. （漢）蔡邕，《蔡中郎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約1912-1949，縮印華氏活字本），卷5，〈陳留索胥上里社銘〉，頁33；（唐）獨孤及，《毗陵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約1912-1949，縮印趙氏亦有齋校刊本），卷12，〈唐故右金吾衛將軍河南閻公墓誌銘并序〉，頁75-76。
5. （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卷9，〈唐人書楊公史傳記〉，頁218。
6. （宋）王厚之，〈書《石鼓文》後〉，收入曾棗莊主編，《宋代序跋全編》（濟南：齊魯書社，2015），頁4287-4288。
7. （宋）高彞，《恭思陵宸翰拓本卷後》，收入《菊礪小集》（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汲古閣景宋鈔本），頁15b。
8. 王連起，〈《蘭亭序》重要版本簡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409-410。
9. 以下參（宋）桑世昌「傳刻」、「定武」條下，見氏著《蘭亭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清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卷11，頁89-90。另外亦加入《定武蘭亭序韓珠船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及本館「庚之三 莫知所出本」等《游相蘭亭》作比較。參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特別展「書聖 王羲之」》（東京：每日新聞社、NHK等，2013），頁131。
10. （宋）桑世昌，《蘭亭考》，卷11，頁89-90；王連起亦引述，見〈《蘭亭序》重要版本簡說〉，頁404-419。
11. （宋）米芾，《寶晉英光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據涉園梓舊本排印），卷3，〈劉涇新收唐絹本蘭亭作詩詢之〉，頁14。
12. 王連起，〈《蘭亭序》重要版本簡說〉，頁162-163。
13. 「□之四 湯舍人本」，從殘留的豎點推測，其編號應是「丁之四」或「辛之四」；「宋拓王沈本」圖版見於《蘭亭圖典》，頁148-151。
14. 參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特別展「書聖 王羲之」》，頁130-131，圖版77、79。
15. （宋）王厚之，〈跋長興施氏本〉，收入（宋）桑世昌，〈審定上〉，《蘭亭考》，卷6，頁54。
16. 載於（宋）桑世昌，〈審定上〉，《蘭亭考》，卷6，頁54。
17. 「湯舍人」即湯宏，任「右閣門」，負責京師官員朝參、禮儀等；「乙之一 雙鉤部分字本」本歸「會稽」條下，（宋）桑世昌，《蘭亭考》，卷11，頁90-91。
18. （宋）樓鑰，《攻媿集》，收入裘成源編著，《歷代論書詩注評》（寧波：寧波出版社，2000），卷2，〈跋汪季路所藏修禊序〉，頁159-160。
19. （宋）王柏，《魯齋集》（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民國續金華叢書本），卷2，〈題定武蘭亭副本〉，頁8a。
20. （元）趙孟頫，〈蘭亭十三跋之二〉，收入渡邊隆男編，《元趙子昂蘭亭十三跋》（東京：二玄社，1975），頁14、55。